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與 領導者的互作方法

幹部學習材料

華北軍區政治部

性則原的克維什爾布論 法方作工的者導領與

★ 料材學習部幹 ★

目 錄

- (5) 815
5144
-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一)
 -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九)
 -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下培養幹部 (一七)
 - 論忠誠與老實 (二七)
 - 與羣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三四)
 -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什維克高貴的品質 (四一)
 -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四九)
 -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五七)
 -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 (六四)
 -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七〇)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藍列波巨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方面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人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驗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底從於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件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露了——這些雜誌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庸俗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

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使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知識份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耻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存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夠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黨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地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睛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為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

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會從政治活動家變成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尋租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在蘇聯不定的一派，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冤枉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些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零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黨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枯竭的精神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為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露了「克拉斯諾達爾礦」托拉斯和「卡塞也夫鐵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數礦井中採煤量的真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起

這不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到企業中領導者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誠懇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一）『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第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為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不允許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樂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本上磨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企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耐受忍耐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和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的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曾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研究了莫斯科——庫爾斯科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

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覩，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露與糾正，對教育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堅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份子之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蕪意識的例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忙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該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該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原蘇聯省委的委員們，在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趁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諉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犯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會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覩，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以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

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地諒解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

（亞天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

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地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七卷，三百零五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責備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目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昏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醒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

始，可是當它不被及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害瘡，但如果這瘡症開始腐爛時，就可演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逃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就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不能以個人利益或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人或事物，而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盡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困難悲嘆，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不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為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疾病，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從家庭親友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即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的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為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為骨肉懶散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礙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從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南俄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拖拉機站，在很长時期中，都認為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很好，它底領導能受到無限讚揚，但沒能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延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擊』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

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你所說的卻快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具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的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為，不能不受到追究。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夠，斯大林曾指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露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群衆在積極分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優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錯誤的不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負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大會研究學術的本質，沒有正確的領導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懂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群衆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分子，而領導上的任務，恰在積極分子份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有効，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為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含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

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為教育的方法，因為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上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聯共（布）烏得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為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護他們的缺點，姑息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息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要多麼高的職位，只要是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為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功之後，就仰首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為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對那些既無才智又無骨氣的頹邁人才有可憐的。在工作中沒有原則性，對自己行動不拘束的工事來說，已經已開拓到阿波洛時代的土壤中，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者，不但在缺點中尋找自己的等級，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裡，互相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疏遠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口錯誤，並且把事情糟了，但是李四不願批評他，不願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為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說王原諒或——李四，因為怎麼說保鑿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气氣，和平相處，多好呢？將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麼？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為什麼竟毫無批評這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湖天復地的人，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確嗎？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忽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忽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吉斯羅貝共和國的國家核子機構，在檢查該